

外资银行股权进入和银行绩效 的联动效应^{*} ——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伍志文¹, 沈中华²

(1. 中国银监会 博士后流动站, 北京 100800; 2.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 天津 300071)

摘 要:文章从微观角度研究外资股权进入对东道国银行绩效的影响,发现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绩效的影响与母国和东道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存在典型的不对称效应,并不是所有的外资股权进入都对国内银行有利。实际上,只有来自于高收入国家的外资股权进入才是有利的。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研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以持股方式进入发达国家提供支持,相反,支持发达国家的银行以持股方式进入发展中国家。这与目前外资银行股权进入的实际情况是比较一致的^①。

关键词:外资银行;股权进入;银行绩效;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8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9)01-0111-12

一、引 言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金融自由化为银行跨国经营创造了条件,外资银行在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中的股份大幅度增加。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互相持股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存在着激烈争论。一些研究者认为新兴市场国家中外资银行股权进入有利于该国银行业的整体稳定,特别是在外资银行自身非常稳健而且其所在国金融监管良好的条件下,外资的银行进入提供了一种激励,促进了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导致国内银行剩余利润减少,改进了银行效率。虽然外资银行进入可能会加大成本,但支持者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国内银行系统所带来的收益将远远大于它所带来的任何损失。Claessens, Demirgüç-Kunt 和 Huizinga (以后简称 CDH)(2001)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种观点。他们发现外资银行进入与国内银行盈利性、非利息收入、间接费用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带来了显著的竞争效应和效率改进效应。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则给出了相反的观点和

收稿日期:2008-09-23

作者简介:伍志文(1975—),男,湖南浏阳人,中国银监会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沈中华(1950—),男,台北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证据。Bayraktar 和 Wang(2004)使用不同的样本重新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外资银行股权与间接费用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他们还证明外资银行股权和银行盈利性、贷款损失准备金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任何关系。有趣的是,他们按自由化进程的年代顺序对样本国家进行分类,结果支持 CDH 关于外资银行进入提高了先开放股票市场而不是先开放资本账户国家的国内银行竞争的观点。Hermes 和 Lensink(2002)通过使用欠发达国家(LDC)国内银行的样本重新检验了 CDH 的研究,发现外资银行进入和国内银行收入、利润和间接费用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也就是说,上述的竞争效应和效率改进只有在外资银行进入水平达到某个最低水平时才会发生。

本文从微观角度考察 CDH 所研究的类似问题。早期考察的相关研究大部分集中于外资银行进入如何影响银行的竞争环境。在这些研究中,外资份额(Foreign Share,以 FS 表示)是指外资银行的数目除以一个给定国家的银行总数,或者外资银行资产除以一个给定国家的银行总资产,外资银行被定义为外资股权超过 50%及以上的银行。他们的研究围绕着外资银行的数量如何影响国内银行业的经营环境,进而影响银行的竞争展开。他们都赞成一个拥有更多外资银行的国家能增强银行业竞争,因而减少国内银行的净利息收益和利润。我们把这类研究称之为宏观观点。总的说来,现有的大多数研究都忽略了外资股权进入对国内银行的影响,并不适合分析中东欧和中国等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银行互相持股的情形。宏观方法以东道国为中心,而微观方法以国内银行为中心。正是因为关注点不同,我们对外资份额的定义就不同于 CDH 所使用的定义。我们这里所指的外资份额(FS),是指外资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国内银行股权的比例,称之为微观观点。

本文重点研究外资银行股权进入对东道国银行绩效的影响,进一步把外资(股权)的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阶段都考虑进来。在 CDH 等的研究中,隐含了外资银行都有先进技术的假设,他们的进入肯定会对国内银行带来积极影响。然而,很显然,一个来自欠发达国家(LDC)的外资银行很可能不会有比发达国家的国内银行还要先进的技术,Nolle(1995)就发现在美国的外资银行的利润率比它们的美国同行要低。许多对发达国家外资银行进入的研究也发现,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外资银行的效率比美国国内的银行要低。对发展中国家外资银行进入的研究则出现了相反的结果,外资所属的国家与东道国的相对经济发展阶段确实对外资银行进入效应有影响。同样,Berger 等(2000)发现,法国、德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等成熟市场中,外资银行的利润效率和成本效率都比国内银行要低。在这种情况下,外资银行进入既不会增强市场的竞争,也不会提高国内银行的效率。受此启发,我们把样本国家分为富国和穷国,考察外资股权进入对一国银行业绩的影响是否与母国和东道国的发展水平有关。我们假设,与来自落后国家的同行相比,来自发达国家的外

资股权更有利,因为它能带来现代的经营技术等。实际上,这个假设可能不完全客观,但也不会距离事实太远。基于此,我们假定只有来自发达国家的外资股权对欠发达国家的国内银行有利,而来自欠发达国家的外资股权不会对发达国家的国内银行有帮助。但是,关于来自发达国家的外资股权对发达国家的国内银行的影响,则是未知的;我们也不确定当外资股权和国内银行都属于欠发达国家时的情形。我们的实证研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二、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想要解决与外资银行进入有关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外资银行是否做得比国内银行要好?二是外资银行是否通过提供新的服务从而提高银行业竞争和效率,是否在其他国家的银行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三是当面临宏观经济波动时,外资银行是否有利于东道国银行部门的稳定?

关于外资银行是否做得比国内银行要好,存在不同观点。CDH(2001)认为发展中国家外资银行的利润比国内银行要高,发达国家的情况则相反。外资银行的业绩取决于它们所在的国家。Goldberg、Dages 和 Kinney(2000)发现,阿根廷和墨西哥的外资银行要比其国内银行更健康。Montgomery(2003)则认为,使用股权收益、成本收益比率以及问题贷款占总贷款的比率进行比较,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许多亚洲国家的外资银行绩效比国内同行差。Meltzer(1998)也持有类似观点,认为国内银行对国内的情况更了解,与国内社会也有更好的、更紧密的联系,从而可以保持它们的竞争优势。

关于外资银行进入是否影响了国内银行的业绩,同样存在不同答案。一些研究者认为外资银行进入使国内银行不得不放弃它们对曾经的高利润所拥有的想当然的权利,迫使它们努力提高效率,效率的提高反过来降低了它们的成本,因此外资银行进入能够降低国内银行的支出,因为它们能学到现代的银行经营技术。作为一个扩展,外资银行进入可能会通过提高银行部门的整体效率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借款人受益(Clarke、Maria 和 Peria,2001)。

当面临宏观经济波动时,外资银行对东道国的银行系统稳定有利还是有害,观点远未统一。Goldberg、Dages 和 Kinney(2000)指出,1994—1999 年间在阿根廷和墨西哥的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相比,贷款增长变化更小,由此认为外资银行进入不一定会威胁到东道国金融部门的稳定。Goldberg(2001)对美国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发现危机之后银行并没有显著减少贷款。Hass 和 Lelyved(2003)指出,在中东欧危机期间国内银行收缩了它们的信贷和存款基础,而外资银行则并未如此。Morgan 和 Strahan(2002)也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可能会减弱危机期间东道国的一般银行资金对公司投资流动性不足的影响,因为外资银行能得到母公司的流动性和资金的支撑。Hass 和 Lelyved(2003)则认为外资银行的信贷供给可能没有国内银行稳定,因为外资

银行对东道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反应更为顺周期。Montgomery(2003)也认为,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外资银行贷款可能比国内银行贷款更稳定,但是当危机发生时,外资银行贷款的稳定性取决于外资银行进入的方式。外资银行的跨境要求权提供的信贷供给是最不稳定的,其次是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贷款和外资银行附属机构信贷。

三、数据、模型和实证分析

理论上,如果外资银行拥有先进的经营技术,外资股权进入就能很好地改善国内银行的业绩。当外资银行的母国是发达国家,而东道国是欠发达国家时,外资银行股权进入的积极影响尤其突出。因此,我们把外资股权分为来自高收入国家(HIC)股权和低收入国家(LIC)股权两种类型,构建一个虚拟变量 D_{HIC} 。当外资银行来源于高收入国家时,它的值等于 1,否则等于 0。因变量 y 衡量银行业绩,包括净利息收益(NIM,净利息收入比总资产)、资产收益率(ROA,利润比总资产)、间接费用(Overhead,员工费用)、问题贷款比例(PLR,问题贷款比总贷款)和贷款损失准备金比例(PLL,贷款损失准备比总资产)。估计模型为:

$$y_{ijt} = (\alpha_0 + \alpha_1 FS_{ijt} + \alpha_2 bank_{ijt}) D_{HIC,j} + (\beta_0 + \beta_1 FS_{ijt} + \beta_2 bank_{ijt}) (1 - D_{HIC,j}) + \phi_1 Macro_{jt} + \phi_2 FM + \epsilon_{ijt}$$

其中下标 i, j 和 t 代表在时期 t 银行 i 在东道国 j 内。因此, y_{ijt} 是表示银行 i 在东道国 j 的 t 时期内的业绩变量(考虑母国和东道国所处的发展阶段)。除了把外资银行分为来自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以外,还把东道国分为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并且研究一种特定类型的外资股权进入(来自高收入或者低收入国家)对国内银行(高收入或低收入国家)业绩的影响。变量 FS_{ijt} 代表银行 i 在 t 时期内在国家 j 所拥有的外国股权的比例, $Bank_{ijt}$ 代表银行 i 在国家 j 在 t 时期内银行变量的向量,具体包括杠杆率(Leverage,资本比总资产)、管理效率(Manage,生息资产比总资产)和营运效率(Operate,总贷款比总存款), $Macro_{jt}$ 代表国家 j 在 t 时期内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向量。此外, $\alpha_i, \beta_i (i=0, 1, 2)$ 和 $\phi_i (i=1, 2)$ 分别是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系数; ϵ_{ijt} 是一个误差项。宏观经济变量(Macro)包括通货膨胀率(Infla)、人均真实 GDP(GDPper),金融市场变量(FM)包括商业银行向私人部门贷款占 GDP 的比率(Lending)、市场资本总额占 GDP 的比率(MarCap)、股票收益率(StockRe)。

(一)资料来源

本文是基于 CDH、Demirgüç-Kunt、Levine 和 Min(1998)的研究,并通过 Fitch IBCA 提供的 BankScope 数据库补充相关数据资料。Fitch IBCA 所提供的数据相当广泛,收集了大约占每个国家所有银行资产 90% 以上的银行数据。为确保研究中每个国家都有合理的覆盖,我们选择那些在给定的年限内

至少有三家银行(国内或外资)资料的国家。CDH 指出了这个数据库的两个局限,一是不允许我们把批发和零售银行市场区分开来,二是也没有区分外资的新设进入和通过收购国内银行而实施的外资进入。获得外资股权比率后,我们以世界银行的分类把国家分为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这里高收入国家包括高收入和中上收入水平的国家,低收入国家包括中下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关于外资股权的比例和名字,对从 BankScope 获取的资料需要注意两点:第一,通常由外国人持有的比例在 BankScope 中没有,使得我们无法计算正确的比例;第二,就算是比例可以获得,股东的名字也是没有来源国的一些法人实体,比如投资信托或者来自开曼群岛之类的离岸金融市场的股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发现外资来源国的名字,增加了区分它们是高收入还是低收入国家的难度。此外,即使知道股东名字,也可能不知道国家的名字,对此我们放弃了这些资料。由于本文集中讨论外资股权进入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因此要排除那些不经营存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比如私人银行和投资银行。为此,我们排除资产回报率超过 4%及资本充足率超过 30% 的银行(根据现有的研究,这些银行不符合传统的商业银行标准)。

(二)基本资料

本文使用 47 个国家的资料,其中只考虑了商业银行,并计算了外资银行进入国内市场的比率。此外,我们还从宏观角度,利用 2000—2004 年间外资银行数量占银行总数的比率、外资银行资产占总资产的比率来衡量外资银行进入度,以便于检验这些数据是否与 CDH 以及其他研究者使用的资料一致^②。根据机构数量指标,外资银行比率最高的是土耳其,为 100%;其次是爱尔兰,超过 60% 的银行为外资所有;再次是荷兰,46% 的银行是外资银行。比率最低的是瑞典(0.0%),其次是日本(0.03%)。对于资产占比而言,外资银行比率最高的是秘鲁(67.88%),其次是津巴布韦(32.25%),排位靠后的是瑞典(0.0%)、南非(0.1%)和日本(1.13%)。以瑞典为例,结果与 CDH 的基本资料高度一致。本文进一步根据银行所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资银行进行分类。对低收入、中下收入水平、中上收入水平和高收入国家来说,外资银行数量占所有银行数量的比率分别是 24.6%、39.4%、16.9% 和 25.8%^③。中下收入水平的国家拥有最高的外资银行比率。当使用外资银行资产的比率时,也出现了类似的结果。

我们利用净息差、资产回报率、间接费用、问题贷款比例和贷款损失准备金比例来衡量银行绩效,统计分析发现:(1)当高收入国家银行的外资股份来自高收入而非低收入国家时,银行的净息差更高,可能是因为高收入国家外资股权的进入对银行带来了压力,警告它们不要为边际贷款人而竞争,应该停止价格竞争。至于资产回报率,当高收入国家银行的外资股份来自高收入而非低收入国家时,银行的资产回报率更高。因此,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外资股权似乎提高了高收入的东道国银行业绩。但是,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外资股权的间

接费用也较高。除了加拿大、爱尔兰、新加坡和英国以外,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外资股权的问题贷款比例也较高。对贷款损失准备金比例来说,结果也一样。因此,就高收入国家的银行绩效而言,当外资股权来自高收入与低收入国家时是不一样的,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外资股权似乎有较高的收益率和较高的风险。(2)对中上收入国家的国内银行而言,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外资股权也同样表现出较高的风险和较高的收益,但最后的结果不如高收入国家明显。比如,当外资股权来自高收入国家时,对韩国来说,净息差较低;而对希腊来说,则资产回报率和间接费用较低。当银行业绩用问题贷款比例和贷款损失准备金比例衡量时,也出现类似的结果。(3)对中下收入水平国家的国内银行而言,外资股权有较高的收益和更多的风险。比如,当外资股权来自高收入国家时,对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约旦和菲律宾来说,净息差较低。(4)对低收入国家中的国内银行而言,除了乌拉圭以外,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外资股权有较高的收益率和较大的风险。这说明当国内银行也属于高收入国家时,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外资股权有更高的收益率和更大的风险,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如果外资股权和国内银行都是属于高收入国家,银行之间可能会有很强的学习效应。来自低收入国家的外资股权看起来对国内银行的影响很小,不管国内银行所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

(三)实证分析结果

1. 外资股权被分成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

首先我们对东道国没有根据收入水平进行划分,只对外资来源的母国收入水平进行分类。当采用净息差(NIM)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时,方程为:

$$NIM = 0.59 - 0.001FS_{HIC} - 0.04Leverage - 0.5Manage + 0.000005Operate + 0.000002PLR \quad (1)$$

(11.2) (-0.43) (-3.6) (-10.2) (0.67) (6.5)

$$NIM = 0.08 - 0.0011FS_{LIC} - 0.05Leverage - 0.001Manage - 0.001Operate + 0.002PLR \quad (2)$$

(3.6) (-0.34) (-3.5) (-0.057) (-26.6) (0.27)

从方程(1)中可以发现,当外资股权来自高收入国家时,外资股份的系数为负,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外资股权不会影响国内银行的净息差。从方程(2)可以发现,当外资股权来自低收入国家时,回归方程中的系数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外资股权的进入不会影响净息差,不管它们的来源是什么。我们引入宏观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同样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当采用资产回报率(ROA)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时,方程为:

$$ROA = 0.5 + 0.07FS_{HIC} + 0.2Leverage - 0.4Manage - 0.0002Operate - 0.000002PLR \quad (3)$$

(1.6) (2.2) (-1.03) (-1.6) (-1.5) (-1.57)

$$ROA = -0.7 - 0.1FS_{LIC} + 0.07Leverage + 0.7Manage + 0.0015Operate - 0.05PLR \quad (4)$$

(-1.6) (-0.97) (0.33) (1.34) (1.37) (-0.54)

从方程(3)可以发现,当外资股权来自高收入国家时,外资股份的系数为

正,而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外资股权提高了国内银行的资产回报率。从回归方程(4)发现,当外资股权来自低收入国家时,这种有利影响不复存在。外资股份的系数为负,而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并不是所有的外资股权进入对国内银行都有利。我们发现来自发达国家的拥有先进经营技术的外资股权增加了国内银行的资产回报率,这与宏观观点相反。

当采用间接费用(Overhead)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时,方程为:

$$\text{Overhead} = 165 + 184\text{FS}_{\text{HIC}} - 314\text{Leverage} + 418\text{Manage} - 0.7\text{Operate} - 0.001\text{PLR} \quad (5)$$

(1.5) (3.0) (-2.5) (2.7) (-4.1) (-1.9)

$$\text{Overhead} = 600 + 9.6\text{FS}_{\text{LIC}} + 272\text{Leverage} - 597\text{Manage} - 0.2\text{Operate} - 247\text{PLR} \quad (6)$$

(3.2) (0.14) (2.9) (-2.9) (-0.89) (-4.1)

从方程(5)和方程(6)可以发现,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外资股份系数显著为正,但是当外资股份来自低收入国家时,外资股份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外资股权显著增加了东道国银行的间接费用,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拥有外资股权的东道国银行更愿意雇佣高质量的员工,投资于人力资本或者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结果造成较高的间接费用。当进一步引入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时,外资股份FS同样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符号没有发生变化,这说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当采用问题贷款比例(PLR)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时(估计模型略),发现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外资股份系数显著为负,而来自低收入国家的外资股份系数不显著。意味着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外资股权可能在参与关系贷款方面非常谨慎,从而降低了不良贷款。另外,它们可能有先进的信贷风险控制技术,从而有利于减少问题贷款。相反,来自低收入国家的外资股权,它们可能没有认识到问题贷款的严重性,缺乏好的风险管理技术,从而导致系数很不显著。

当采用贷款损失准备金比例(PLL)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时(估计模型略),发现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外资股份系数显著为负;而当外资股权来自低收入国家时,系数显著为正。如上文所述,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国股权的进入减少了东道国银行的问题贷款,因此,相应的贷款损失准备金比例也会减少。

2. 外资股权的母国和国内银行所在国都被分为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

我们把外资股权的来源国及其东道国都分为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研究外资股东进入的影响。当采用净息差(NIM)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时,方程为:

$$\text{NIM}_{\text{HIC}} = -0.01 + 0.00006\text{FS}_{\text{HIC}} + 0.005\text{Leverage} + 0.02\text{Manage} - 0.00001\text{Operate} + 0.002\text{PLR} \quad (7)$$

(-0.7) (1.9) (0.6) (1.3) (-1.4) (0.57)

$$\text{NIM}_{\text{HIC}} = -0.008 + 0.00003\text{FS}_{\text{LIC}} + 0.015\text{Leverage} - 0.002\text{Manage} + 0.02\text{Operate} + 0.02\text{PLR} \quad (8)$$

(-0.68) (0.66) (1.15) (-0.15) (4.5) (1.9)

$$\text{NIM}_{\text{LIC}} = 0.67 + 0.0009\text{FS}_{\text{HIC}} - 0.23\text{Leverage} - 0.58\text{Manage} - 0.0028\text{Operate} + 0.000002\text{PLR} \quad (9)$$

(7.2) (2.7) (-4.1) (-6.2) (-1.8) (1.9)

$$\text{NIM}_{\text{LIC}} = 0.07 + 0.0002\text{FS}_{\text{LIC}} - 0.108\text{Leverage} + 0.08\text{Manage} - 0.0016\text{Operate} - 0.0056\text{PLR} \quad (10)$$

(1.2) (1.18) (-2.9) (0.97) (-10.2) (-0.23)

从方程(7)和方程(9)可以发现,当外资股权来自高收入国家时,东道国分别为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外资股份的系数分别是 0.00006 和 0.0009,且两者均是显著的。这说明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外资股权增加了国内银行的净息差,不管东道国经济发展阶段如何;但是当东道国是低收入国家时,外资股权进入的影响比较大,因为系数比较大,这与前面的统计分析结果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外资股权并不急于吸引存款和支付更低的存款利率,它们没有参加利率的竞争,因此所观察到的净息差就比较高。从方程(8)和方程(10)可以发现,当外资股权来自低收入国家时,外资股份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外资股权进入对银行净息差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无论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如何,这与前面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当采用资产回报率 ROA 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时,方程为:

$$ROAHIC = 5.3 - 0.0005FS_{HIC} - 0.4Leverage - 5.3Manage - 0.00001Operate - 0.2PLR \quad (11)$$

(2.19) (-0.46) (-1.2) (-2.2) (-0.08) (-0.3)

$$ROAHIC = -0.2 - 0.001FS_{LIC} - 0.1Leverage + 0.3Manage + 0.24Operate + 0.02PLR \quad (12)$$

(-1.8) (-1.8) (-1.4) (1.9) (3.2) (1.0)

$$ROALIC = 0.1 + 0.002FS_{HIC} + 0.6Leverage + 0.2Manage + 0.004Operate + 0.000001PLR \quad (13)$$

(0.2) (0.7) (1.5) (0.5) (0.47) (0.33)

$$ROALIC = -4.5 - 0.006FS_{LIC} - 0.7Leverage + 0.1Manage + 0.0009Operate + 0.09PLR \quad (14)$$

(-1.2) (-1.28) (-1.0) (0.18) (0.6) (0.6)

从方程(11)和方程(13)可以发现,当外资股权来自高收入国家时,外资股份系数是不显著的,不管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从方程(12)和方程(14)发现,当外资股权来自低收入国家时,如果国内银行属于高收入国家,则资产回报率会下降,即来自欠发达国家的外资股权无疑会减少发达国家的国内银行利润。

当采用间接费用(Overhead)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方程为:

$$OverheadHIC = 4688 - 2.1FS_{HIC} - 535Leverage - 3765Manage - 0.7Operate - 291Probloan \quad (15)$$

(4.3) (-1.3) (-1.8) (-3.2) (-2.9) (-0.7)

$$OverheadHIC = 1051 - 2.2FS_{LIC} + 193Leverage - 773Manage + 101Operate - 371Probloan \quad (16)$$

(2.2) (-1.0) (0.6) (-1.3) (0.6) (-2.3)

进一步,我们引入宏观控制变量,回归方程为:

$$OverheadLIC = 181 - 2.9FS_{HIC} + 295Leverage + 74Manage - 0.7Operate + 0.001PIR \quad (17)$$

(1.5) (-3.4) (2.6) (0.8) (-0.22) (1.6)

$$-3Infla + 3GDPper + 0.6Spread - 1.1Makcap + 0.9Lending + 0.6Stockre$$

(-0.57) (0.59) (0.45) (-2.2) (0.9) (1.0)

$$OverheadLIC = 328 + 1.3FS_{LIC} + 289Leverage - 597Manage + 0.4Operate - 60PIR \quad (18)$$

(1.8) (2.6) (3.6) (-2.6) (2.2) (-0.8)

$$-3Infla + 3GDPper + 0.6Spread - 1.1Makcap + 0.9Lending + 0.6Stockre$$

(-0.5) (0.59) (0.45) (-2.2) (0.9) (1.01)

从方程(15)和方程(16)可以发现,外资股权对发达的东道国银行的间接

费用没有显著影响,不管其来源如何。从方程(17)发现,当外资股权来自高收入国家时,如果银行属于欠发达的东道国,外资股份的系数是 2.9,而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方程(18)发现,当外资股权来自低收入国家时,系数是 1.3,而且是显著的。换言之,当东道国是欠发达国家时,来自发达国家的外资股权降低了国内银行的间接费用,而来自欠发达国家的外资股权则增加了间接费用;当东道国是发达国家时,外资股权对间接费用没有影响。外资股权对银行间接费用影响与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此外,采用问题贷款比例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发现在外国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确实发生了作用。在发达国家外资股权对银行的问题贷款比例没有影响,不管外资股权的来源如何。这可能是因为那些银行(在发达国家的)已经拥有了更先进的经营技术,因此不会受到外资股权进入的影响。相反,在欠发达国家外资股权进入则有影响。当东道国是欠发达国家时,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外资股份系数分别是 1.9 和 2.4,说明来自发达国家的外资股权减少了欠发达国家的问题贷款的数量,而来自欠发达国家的外资股权则增加了欠发达国家的问题贷款数量。相应地,拥有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的银行不会受到外资股权的影响,而没有先进技术的欠发达国家的银行就会受到外资股权进入的影响。外资股权进入的影响也会因外资股权来源国的收入水平不同而有所不同。当采用贷款损失准备金比例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发现外资股份 FS 的系数都不显著,不管外资股权来源国和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因此,外资股权对国内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金比例没有显著影响。

四、结 论

本文从微观角度研究外资股权进入对国内银行绩效的影响。首先,我们把外资股权来源分为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研究发现,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外资股权没有影响净息差,但是会增加资产回报率和间接费用,同时减少问题贷款比例和贷款损失准备金比例。如果资产回报率和问题贷款比例分别代表银行的收益和风险,则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外资股权增加了国内银行的收益,同时减少了其风险。来自低收入国家的外资股权虽然没有影响净息差、资产回报率、问题贷款和间接费用,但是却增加了贷款损失准备金。换言之,不是所有的外资股权都对国内银行有利。实际上,只有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外资股权进入才是有利的。然后,我们把外资股权和东道国都分成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形成了四种组合,发现每一种组合都对银行业绩有不同的影响。其一,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外资股权对高收入国家的银行有一些影响,但在此组合中,外资股权进入只增加了银行的净息差,对资产回报率、间接费用、问题贷款和贷款损失准备金都没有影响。因为高收入国家的银行大部分已经拥有了现代的经营技术,所以高收入国家的银行财务绩效受外资股权的影响很小,尽管那些股权

也是来自高收入国家。其二,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外资股权对低收入国家的银行有显著影响。在此组合中,外资股权增加了国内银行的净息差,同时减少了其间接费用和问题贷款数量,但是,对资产回报率和贷款损失准备金没有影响。欠发达国家的国内银行的财务绩效确实从拥有现代化的经营技术的外资股权的特殊组合中获益。其三,来自欠发达国家的外资股权对发达国家的银行影响很小甚至没有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来自欠发达国家的外资股权很可能不拥有现代化的经营技术,因此,对拥有现代化经营技术的银行的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其四,来自欠发达国家的外资股权对欠发达国家的国内银行有显著的影响。在此组合中,外资股权降低了国内银行的净息差、增加了间接费用和问题贷款,但对资产回报率、贷款损失准备金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来自欠发达国家的没有先进经营技术的外资股权可能会恶化其他欠发达国家的银行业绩。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绩效的影响存在典型的不对称效应。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研究结论没有为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进入发达国家提供支持,相反,支持发达国家的银行进入发展中国家。这与目前的外资银行进入的实际情况是比较一致的。我国属于低收入国家,引进的境外战略投资者都是来自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外资银行股权进入属于第二种组合的情况,我国的实际情况也与第二种组合的分析结果相类似。近年来,战略投资者的进入提高了我国国内银行的净息差,同时减少了它们的间接费用和问题贷款数量,对资产回报率和贷款损失准备金没有显著影响。我国国内银行的财务绩效确实从拥有现代化经营技术的发达国家外资股权的特殊组合中获益,这也从侧面支持了我们的研究结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从更宽的视角而不仅仅是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待银行业股权开放,并采取积极措施推动中资银行“走出去”,化被动为主动。

* 本文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观点。

注释:

- ①这个结论是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而言的,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就不要“走出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银行来说,银行“走出去”往往是出于学习、布点和谋求战略利益等多种考虑,并不一定是获取短期利润,因此,并不能由此否认银行“走出去”的价值。
- ②衡量外资银行进入度的指标较多,大多数研究都是针对银行新设进入,以外资银行数量与一国银行总数量的比例,外资银行资产与一国银行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本文重点研究的是外资银行股权进入,并利用变量 FS_{it} 来衡量, FS_{it} 代表银行 i 在 t 时期内在国家 j 所拥有的外国股权的比例,这是基于微观视角的研究。
- ③世界银行以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依据,规定 9076 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2936 至 9075 美元为中上收入国家;736 至 2935 美元为中下收入国家,735 美元以下为低收入国家(2004 年)。

参考文献：

- [1] Berger A, DeYoung R, Genay H, Udell G. Globaliza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vidence from cross-border banking performance[R]. Washington, D. C. : Federal Reserve Board, Working paper, 2000.
- [2] Claessens S, Demirgüç-Kunt A, Huizinga H. How does foreign entry affect domestic banking markets[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01, 25: 891—911.
- [3] Crystal J, Dages G, Goldberg L. Does foreign ownership contribute to sounder banks in emerging markets? The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R]. New York: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2001.
- [4] Hermas, Lensink. Foreign bank performance, domestic bank performance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Finance, 2004, 3: 2.
- [5] Hidenobu Okuda, Suvadee Rungsomboon. The effects of foreign bank entry on the Thai banking market: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1990 to 2002[R]. Center for Economic Institution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0, 2004.
- [6] Janek Uiboupin. Effects of foreign banks entry on bank performance in the CEE countries[EB/OL]. www. tyk. ut. ee.
- [7] Nihal Bayraktar, Yan Wang. Foreign bank entry, performance of domestic banks and the sequence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R]. World Bank, WP3416, 2004.
- [8] Robert Lensink, Niels Hermes. The short-term effects of foreign bank entry on domestic bank behaviour: Does economic development matter? [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04, 28: 553—568.
- [9] Unite A A, Sullivan M J. The effect of foreign entry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on the philippine domestic banking market[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3, 27: 2323—2345.

The Linkage Effect between Foreign Banks’ Equity Entry and Banking Performance ——Based on Panel Data Analysis

WU Zhi-wen¹, SHEN Zhong-hua²

(1. *Postdoctoral Research Center, 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Beijing 100800,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foreign banks’ equity entry on banking performance of host country. The impact of foreign banks’ equity entry on banking performance of host countr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of home country and host country. There exists typical asymmetric effect and some domestic banks couldn’t benefit from foreign banks’ equity entry. In fact, only (下转第 143 页)

- [14] Witmer, Jonathan. Why do firms cross-delist? An examination of the determinants and effects of cross-delisting [R]. Financial Markets Department, Bank of Canada, Working Paper, 2006.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Delisting Provision in China

FENG Yun¹, LIU Yan-qin²

(1.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52, China;

2. Shanghai Branch,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Shanghai 200023,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delisting provision in China through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ssets quality and profit-earning ability of ST listed companies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s on retaining listing qualifica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ST listed companies still widely gets worse after the special treatment has been revoked. It indicates that listed companies lack of concerns on the improvement of operation performance, thu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delisting mechanism has been weakened in the long term.

Key words: delisting provision; special treatment; Logistic regression

(责任编辑 喜 雯)

(上接第 121 页)

foreign equity entry from high income countries is helpful to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banks. The study couldn't provide supports about bank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entering into developed countries through equity participation. But it supports the reverse statement. It comes up to the real situation of foreign banks' equity entry at present.

Key words: foreign bank; equity entry; banking performance; panel data

(责任编辑 喜 雯)